日本國會大選結果對台灣的影響

●李明峻／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

一、日本政黨輪替的國內意涵

日本民主黨能取得政權的原因，主要是因爲日本經濟持續停滯、衰退，甚至今（2009）年GDP還將下降6%，而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卻找不到出路，讓日本人民一再失望，只得嘗試將機會給還不敢太放心的民主黨。因此，民主黨可說是臨危受命，取得政權的喜悅不會太久，馬上必須面臨國政的壓力，如果表現不佳，很可能面臨下一波的政界再變甚至政黨再輪替。

此次政黨輪替是日本人民認爲自民黨政府難有作爲，以及黨內權力鬥爭形成政治僵局，但此點對日本長遠的發展甚至亞洲的前景未必不好。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日本經濟泡沫後停滯十幾年，讓日本錯失繼續主導亞洲發展的機會。中國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個缺失，成爲亞洲經濟動力的重要引擎，然而日本畢竟還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掌握著大量尖端的高科技，甚至諸如新能源、綠色科技、生物科技等新增長領域，一旦擺脫政治上的制約，應當還可以大有所爲。

再者，後冷戰時代出現劇烈的國際變化，使日本人開始質問其國際角色的問題，而其1990年代長期的經濟蕭條，則使日本人重新反省其二次大戰後的國家體制與發展的問題。針對這兩個問題的反省，使得日本社會在過去十幾年間在政黨和政府兩方面發生重大變化。在政黨方面，1994年的選舉制度改革取消中選區制度，自此黨內派閥的力量開始弱化，政黨本身的力量開始加強，日本開始自派閥政治走向政黨政治。在政府方面，2001年元月進行政府改造，大幅削弱傳統菁英職業官僚，各部會的政務官自二位（大臣及政務次官）大幅增加至六位（一位大臣、兩位副大臣、三位政務次官），職業官僚的頭──事務次官被淪爲老七，顯見省廳政務官權力擴大的趨勢。此次政黨輪替是日本在這兩方面重大變化的一個終結，此後將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

二、東北亞國際環境的變化

在日本民主黨取得政權之前，韓國、台灣甚至美國都已發生政黨輪替，整個東北亞的國際環境發生變化，我國應密切注意東北亞進入「多極體制」時期。

過去東亞是由中國一國獨大二千多年，隨後日本在東亞獨大五十多年，二次大戰後是美國在此地區單獨超強，東亞都是由一國主導的形式。然而，現在美國在此地區單獨超強的地位弱化，它會繼續陷在中東糾葛無暇他顧；但美國不會離開亞洲，卻也不能壓制亞洲。中國雖然崛起，但也不可能完全壓制日韓。日本仍是區域強權，但絕無可能做爲亞洲的唯一龍頭老大。未來幾十年，亞洲大國格局會很像十九世紀歐洲強權關係，大國間合縱連橫、相互制衡。

在前述變化之下，目前東亞域內國家都以務實方式處理國際關係，不過爭議性高的政治問題並未獲得真正的解決，例如日韓之間的領土爭議、中日之間的釣魚台問題和東海油田問題，這些政治問題的發展仍然值得密切注意。中、日、韓三國建立同盟短期內是絕無可能的，但建立三國首腦定期例行高峰會卻有可能，南韓構想的美、日、韓聯盟是不可能的，但中、日、韓聯盟也無可能，前者是因爲會產生對抗後果，後者則是內部矛盾存在，但是共同高峰會則有益無害的。

基本上，亞太地區不像過去北約（NATO）對華沙公約組織，有二極化對立的問題，但由於存在中日韓台在地緣政治學上的複雜條件，使得冷戰終結後仍存在各種變數，伴隨著安全保障等共同關心事項之擴大增多，此地區正在構築像東南亞國協（ASEAN）區域論壇（ARF）般寬鬆的地區對話與協力組織。台灣應展開全方位外交，而勿一面倒地傾向中國。

三、日本新內閣外交政策的變化

由於政黨輪替將加速日本政界出現世代交替。因政壇少壯派勢力的壯大，原本沈潛在年輕菁英的新想法也隨之進入政壇及輿論的主流，影響日本的政治議程。年紀在卅五至四十五歲間的政治菁英，橫跨包括政黨、政府官員、學術界以及輿論界等領域，也是最獨立於政黨，企圖心也最強的世代政治力量。即使是六十歲級的老牌國會議員也都出生於戰後，歷經1960～1980年代快速的經濟成長，以及長期浸淫在民主政治的洗禮，因此對於民主價值高度共鳴，同時也對日本的國際力量比較具有自信。他們認爲日本外交的基礎是日本的「國益」，而不是傳統的感情連帶，傾向在共同的戰略利益下，以理性的方式處理日本的對外關係。

對日本新內閣的外交政策而言，如何穩定維持日美同盟是一大課題。民主黨過去反對以「反恐對策特別措置法」在印度洋爲美軍船艦加油，反對美軍基地佔用土地等問題，要求與美國平起平坐，希望美日中成爲等邊三角形，這些有可能動搖日美同盟關

係。特別是今（2009）年日本將提出新的防衛大綱，明年是日美安保同盟六十週年，日本民主黨新內閣如何因應，將成爲未來美日關係的重要指標。

另一方面，儘管日本不可能忽視中國崛起的現實，中日關係仍是日本對外關係的重要環節，但經濟才是左右日本國內政治方向的主軸。日本歡迎中國的經濟成長，但日本和中國促進友好關係是手段而非目的，兩國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在日本目前嚴峻的經濟狀況和社會形勢之下，民主黨如何協調和解決自民黨留下的相關政治局面，將受到世界特別是亞洲各國的高度關注。

中日兩國近年來在經濟方面的聯繫愈加緊密，但仍然會受到一些歷史爭論和區域競爭事務的限制，民主黨表示執政期間不會參拜靖國神社，願意和中國領導人保持高層互訪。中日兩國關係現在正處於逐漸改善的過程，兩國的利益也是越來越緊密，目前國際局勢也是很不穩定，維護中日兩國關係穩定的發展，符合雙方共同利益，所以中日發展大的趨勢不會改變。

但另一方面，中國國防預算連續二十年以二位數提升，儼然是東亞新興軍事勢力的崛起，近年來更擴充海權，由一個傳統大陸國家擴張爲具有飛彈優勢與海軍逐步深入太平洋的海權國家（Sea Power）。在同一時期，日本在1990年代後半開始提升日美同盟的內涵，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更進一步直接參與阿富汗反恐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的後援活動。在此情形下，東北亞已成爲世界的火藥庫。除中日國防預算達四、五百億美元之外，韓國也逐步投入鉅資開發、研製和引進大批的世界先進軍事技術，製造和裝備自己的先進軍事武器。近十年來，韓國爲追求和提高自主國防能力，將軍隊建設視爲國家的首要任務，國防預算從1999年開始年年增加，2009年度國防預算總額約爲三百三十億美元，增加超過三倍以上。

因此，在東亞新區域主義中，「東協加三」或「東協加六」並不只於對區域經濟體的摸索，而是蘊藏東亞區域新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東亞新秩序一旦失去「勢力均衡」，亦可能迎接「不確定的時代（Age of Uncertainty）」。在此東亞變動的過程，日本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但從小泉首相就任的2001年開始到現在，日本以民主價值觀爲基礎的「和平與繁榮之弧」的外交戰略受到挫折，日本國內因經濟問題致使執政黨與在野黨爭執日深，如果短期內解散國會而陷入政治紛亂，則日本今後是否能像過去一樣積極參與東亞和平穩定的外交與貢獻不無疑問。日本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面臨嚴重考驗。

四、台日關係的未來動向

對日本而言，討論東北亞安全保障問題絕不能將台灣排除在外。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所需石油和天然氣至少有75％必須經過台灣和菲律賓之間的水道，這是日本

海上運輸生命線。因此，從南韓、日本到台灣、菲律賓，對中國形成一個防衛的態勢，這條防線不能出現缺口，中國如果吞併台灣，就可以自由進出太平洋，如此將一方面控制西太平洋海域，挑戰美國的霸權，另一方面控制南中國海的海路，將整個東南亞置於中國的勢力範圍，從而破壞日本和美國的重大戰略利益，日本的未來亦實堪慮也。因此，維護台海和平關乎日本的國家利益甚大。

台灣對日本的關係必須「正常化」，在對日關係上以客觀、冷靜的地緣政治因素，取代以往主觀、偏頗的文化歷史因素。換言之，台灣必須強調戰略、經貿的地緣政治關係，以對等關係與日本建立合作體制，喚醒日本了解若在國際社會中支持中國對台灣的孤立政策，或是默認中國對台灣行使武力的言行，將會助長中國的霸權主義，強化中國恣意的囂張態勢。若日本容忍中國的霸權主義，不能使中國認識到國際潮流和現實，即等於是支持中國以武力威脅此區域的和平與安全。

同時，日本政黨輪替加速台日關係的世代交替，這顯將使台日關係出現新的挑戰，台灣未來數年之內應早做準備。就此而言，台灣對日本新一代的政、經、學以及輿論界的領袖們，有獨立建立關係的必要，而這樣的關係要建立在對現今日本社會及政治思潮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之上。台灣不能再用六十年前的歷史眼鏡看待今天的日本。今天的日本不是軍國主義，也對於殖民台灣的經驗記憶模糊，台灣要以現在的日本做爲對話的基礎，而對現在的日本確實了解，是台日關係得以發展的關鍵。◆